

锐意创新 与时代同行

我所经历和见证的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事业

吴贻康

▲▲ 上接 3 版

(五)

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国家科委分析认为,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科技外事工作的重点和注意力已到了应向地方倾斜的转折时期。国家科委联合外交部于1986年4月发布192号文件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城市的科技外事工作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由地方科委归口管理”,从而解决了多年存在的地方科技外事归口问题。我在1986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外事工作会议报告中提到:“近年来,我们对地方科技外事工作已逐渐重视起来,但做得还不够。中国经济要振兴,社会要向前发展,光靠中央不行,全国各地都必须行动起来”。宋健主任在最后讲话中说:“把国际科技活动和科技合作项目引向省、区、市,引向内地,引向边远地区,这应该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下发的会议纪要通知中明确提出:“希望各部门和地方对科技外事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尤其是对地方的科技外事工作要给予更多的扶植和帮助”。可以说,192号文件和第四次科技外事工作会议吹响了科技外事工作向地方倾斜的号角。嗣后,我主持于1987年4月在厦门召开的第五次全国科技交流中心会议和1988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科技外事工作为沿海发展战略座谈会上,都专门研究如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探索,推进地方对外科技交流工作,核心在于为振兴地方经济服

务。当时我们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安排政府间合作项目和国际会议有条件的尽可能引向地方;国家科委和国际合作局负责组织的出国团组都吸收地方同志参加;协助地方举办技术展览会和技术贸易活动;为地方引进智力和派出进修开辟渠道;吸引地方干部到国际合作局实习工作;允许地方可以直接与我驻外科技机构联系等。

在开始阶段,我们曾办了几件实事。如1988年为贯彻中央关于支持“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民办科技企业的发展,扶植他们向外向型转化,由中国科技交流中心与8家高新技术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协助其了解国际市场信息,建立国外合作关系,开拓出口渠道等。针对当时出国手续繁琐问题,在中关村试点的基础上,国家科委联合有关单位制定简化办法,由国务院批准后颁布实施,解决了高新技术企业出国难题。这些是科技外事工作促进我国高新区国际化工作的开端。

1991年10月,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科技组在上海举行了科技工业园研讨会,由我作为科技组中、美两主席之一负责组织、主持此次会议。会上9个国家和地区作了12个案例报告,我国中关村、深圳和上海漕河泾科技园作了报告。宋健主任在主旨发言中阐述了我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方针和意愿,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科技园区的国际会议。1996年我国政府批准北京、苏州、合肥、西安、烟台5个高新区作为对APEC开放的工业园区,我还先后与新加坡、俄罗斯、德国、白俄罗斯等在地方合办高新区。今日全国高新区已成为地方上对外开放和科技合作的重要窗口。

1986年起,国家科委积极投入全国扶贫工作,从各局抽调人员参加开发团,并要求各司局发挥自己的特长。大别山革命老区为国家科委分工扶贫区,1987年10月,我和扶贫办马彦民同志到湖北黄冈地区,与国际合作局派去扶贫的于鹰同志一起走访调研后,提出“科技外事为科技扶贫助一臂之力”的思路,根据当地的资源产业特点和需求,将对外合作的项目和人力资源引向地方基层。宋健主任于11月批示:“我完全同意贻康、小马的一些意见。外事工作要为农村经济振兴多做些实事。这对大家真正了解中国国情,推进星火计划都有好处。”嗣后,这一思路便在宁夏、贵州、河北等扶贫地区推广。

为了让外国驻华科技外交官了解我国各地科技发展特点以促进合作,国家科委组织他们到各地去参观。1986年6月,针对美、法航天飞机和火箭相继出事,我国愿提供国外卫星发射服务。为此,国家科委出面组织七国驻华科技参赞和官员,由我带队参观西昌发射基地和绵阳中国气动力研究中心,效果良好。取得首次经验后,在以后3年间,国家科委又组织过8批外国使节到各地参观,我还陪同去过天津和武汉。宋健主任于1988年7月批示:“丽兰同志并贻康同志:这项活动效果非常好,有创造性!几次这类活动都得到了好的结果,建议坚持下去,以带动地方外向型产业的发展,带动地方的开放,同时,也使使节们了解我国的真实情况。希望今后结合沿海发展战略和火炬计划,事先有目标,吸引外资合作。这些外交官的影响是很大的!”

国家科委为发展中国家举办专业技

术培训班是我国技术援外的一种重要方式。1990年3月在北京蔬菜研究中心举办第一个“国际蔬菜培训班”以来,此类培训都是根据各地特长由地方承办,既培训了国外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也扩大了外交影响,促进了科技经贸关系,成为人文外交的一个内容。这项活动30年来从未中断,现在更是成为了“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1987年,在宋健主任领导下,我参与引入了企业孵化器理念,积极推进国际化工作。国际科技合作协会配合在北京、上海、苏州、天津、西安、武汉、成都、重庆和广州建立了9个国际企业孵化器(IFI)。1998年,在取得上海举办企业孵化器国际培训班经验的基础上,我参与促成建立东南西北中五个IFI国际培训基地和举办西安APEC孵化器论坛,成为国际化工作的突破口。1997年,中国国际企业孵化器网络成立,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和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组织,9个IFI每年轮流举办网络年会,构筑各地交流和国际合作的平台,共办了18届,我参加了16届,并参与组织工作。当年企业孵化器的国际化工作成为现今各地“双创”国际化的根基。

地方科技外事工作有个利用地缘优势的问题,所以国际合作司和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将研究不同地区和国别的研讨会都放在相应的地方召开。如199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对东南亚国家研讨会;1992年12月在威海召开的对韩国研讨会;1993年6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独联体和东欧研讨会;1994年8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对中亚、西亚研讨会;1997年4月在成都召开的第二次对独联体和东欧研讨会,以及1994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促进地方对外科技经济合作一体化研讨会”。为了加强地区间的科技外事工作联系合作,交流经验,合作协会与地方联合组织分片联系会议,如1998年8月在天津塘沽举行的华北、东北片会;1999年4月在广西北海举行的中南、西南片会;8月在呼和浩特举行的北方片会等。

今日看到地方科技外事工作蓬勃发展的局面,已构成全国科技外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当年国家科委科技外事工作向地方倾斜的战略决策和所采取的措施是十分正确和有效的。

(六)

做好国际科技合作事业,关键要有一支优秀的科技外事干部队伍,要具备优良的作风。我于1985年年底从美国回国主持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司工作的五年中,我们根据当时国家科委“团结、实干、高效、服务”八字委风,结合科技外事工作特点,提出要树立“满腔热情,冷静思考,雷厉风行,协商共事”的作风。因为我们是全国科技外事工作归口和审批单位,国家授予了一定权力,所以要特别注意对事、对人要满腔热情,给人以方便,这是搞好工作的基本态度;由于科技外事工作涉及许多相关部门的配合合作,所以要提倡与其他部门协商共事的风气。在这种作风的指导下,全司才形成一个战斗集体,在委里多次被评为先进党支部。而领导班子的以身作则和团结尤为重要,当年共事的司领导班子先后有石广长、潘志远、汤卫城、刘永翔和沈庆鉴同志,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奋斗。在1989年2月国家科委专门研究科技外事工作的会议纪要中还提出,要发扬我们所提倡的作风,我也在培训班中宣传这种作风。

建设科技外事干部队伍特别要提高干部素质,为此,国际合作司从1996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科技外事干部培训班”,由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承办,办成了一个高质量的班,创出了品牌,坚持至今未断过。培训班使新同志获得基础知识,便于进入业务角色,使老同志更新知识,掌

握新形势,开拓新视野。开始阶段我参与设计组织课程,自己也编教材授课。我们还根据发展需要办各种培训班,如办过几期“对外合作中知识产权培训班”;又如1993年举办了“科技外事干部提高进修赴美培训班”,由我带队组织25个省市科委外事领导参加,到美国了解世界上科技经济合作一体化的观念和发展。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国家科委1991年支持在上海工业大学创办科技外事专业,由我与校方共同制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在工科三年级选拔学生,再上两年科技外事、外交、经贸课程,强化外语,五年毕业。第一届除我自己授课外,还聘请国家科委黄坤益、贾蔚文、彭斐斐和徐新民四位老师赴沪授课。后由于学校调整变迁共办了9届,有310位毕业生,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了复合人才的优势。

我们要培养科技外事干部软科学的能力,以便能够根据不同阶段国内外形势、环境的变化,具有敏感性和前瞻性,抓住出现的苗头,进行调研作出判断,为决策提供依据,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开拓前进。我自己在职和退休后除主持多项软科学课题研究外,一直倡导科技外事干部也要养成这种风气,组织新老同志一起参加,这也是增加我国科技外事软实力的一个方面。如每年组织“对外科技合作国别研究”“世界科技发展年度述评”“中国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发展战略研究”和“对外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等。在2002年还组织“五科”共同开展了对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的国别研究和研讨会。又如1995年根据当时外国在华办研发机构的现象,对我国利弊得失引起各界关注和争议,经我建议,国家科委立项进行联合调查,分析认为利大于弊,形成1997年国家科委颁发中外办研发机构文件的依据。1999年我又开始主持对跨国公司在华办研发机构进行调研,一直到2007年,明确来讲,也还是利大于弊,要在与其合作互动中达到合作共赢。因此,国家制定了明确方针,鼓励外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华办或独办研发机构。

国家培养一个科技外事干部很不容易,1992年成立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的目的之一是要发挥部分离退休干部的作用,组织各种活动让他们继续做贡献。我于2009年创办了“国际合作沙龙”,到2012年办了8期,由北京海淀、丰台园区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分别承办,针对中小企业走出去和兴办海外孵化器,在国外兴办研发机构、中美科技合作、国家科技合作软实力和弘扬科技外事优良作风等热点问题研讨,也邀请老同志参加,提供一个交流献计献策的平台。国际合作司从2002年至2015年编辑出版了六辑《国际科技合作征程》,老同志所撰写的回忆留下了宝贵史料和精神财富,让后人学习受益。

国家培养一个科技外事干部很不容易,1992年成立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的目的之一是要发挥部分离退休干部的作用,组织各种活动让他们继续做贡献。我于2009年创办了“国际合作沙龙”,到2012年办了8期,由北京海淀、丰台园区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分别承办,针对中小企业走出去和兴办海外孵化器,在国外兴办研发机构、中美科技合作、国家科技合作软实力和弘扬科技外事优良作风等热点问题研讨,也邀请老同志参加,提供一个交流献计献策的平台。国际合作司从2002年至2015年编辑出版了六辑《国际科技合作征程》,老同志所撰写的回忆留下了宝贵史料和精神财富,让后人学习受益。

(七)

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事业是一幅壮丽的画卷,我所写的只是自己经历的片段和体会。为了完整地记录这段历史,在建国50周年时,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和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编辑出版了《当代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史》。这本书由国际合作司老领导陈冰同志倡议,1994年9月批准立项,1995年6月合作协会理事会讨论通过编写方案,由我和合作司王绍祺司长担任主编,陈长斌、徐新民、梅金芳三位同志分工按历史时期执笔编写。我们到有关档案馆查阅、收集了中央部委和地方的大量资料,为了做到图文并茂,由孙毓珍同志和我负责编选了430张历史照片,其中有我提供的100张。我们曾多次组织不同时期科技外事工作领导和干部进行研讨,得到“五科”外事部门的大力支持。宋健、周光召、朱丽兰、路甬祥和张存浩“五科”领导应邀担任顾问并审阅稿件。中科院路甬祥院长审阅文稿后复函:“贻康同志:来函收悉。文稿已阅,深受教益。文稿史实内容精到,涵盖了中外科技交流历史长河中

的重要事例,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历时四年有余,数易其稿,《当代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史》终于在1999年9月9日建国50周年前夕在友谊宾馆隆重举行了首发式,科技界、外交界老领导,以及14个国家和联合国驻华外交官共130人出席,实为科技外事界一次盛会。大家对《合作史》的出版深感兴奋,在我对该书内容和编辑过程做了说明后,有关人士纷纷发言,最后由宋健主任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觉得我们这本书的出版,全面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50年来在对外开放中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记录。该书做到了既忠实于历史事实,又不拘泥于历史细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还引用司马迁的话,说:“这本书值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他还专门对参与编写此书的同志说了一段:“吴贻康同志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是我们大家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在对外科技合作事业中贡献了40年的心血,1990年退休后,他发起组织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在他的领导和很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本书才得以出版,他们是用一生的心血和奋斗来写这本书的。我再一次代表我的朋友和我的同事们向吴贻康同志和其他参加编辑工作的朋友们、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佩。”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国外交系统要总结新中国60年的外交理论和实践,梳理核心理念和基本经验,在国务院和外交部领导下,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于2009年9月组织召开新中国60年外交理论研讨会,并出版《新中国外交60年》文集。编写科技外交方面的任务,通过科技部交到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由我执笔写了《新中国60年的科技外交》,并载入文集。我将科技外交的规律和理念梳理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要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科技外交;二是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开展科技外交;三是要抓住时机开展,不必时时与外交同步;四是要以人为本,开展人民外交;五是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六是要硬实力和软实力并举,并以60年的实践加以阐述。

“纪念新中国外交60年暨2009年慰问驻外外交人员亲属联欢会”于2009年12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是由外交部牵头,与商务部、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总参情报部六个外事口联合主办,中央电视台承办,向世界各地中国260多个驻外机构5000余驻外人员直播。有新老外交官、驻外人员亲属和有关部门领导和干部6000余人参加,我们科技部有300人出席。当年我们已在46个国家、68个使领馆派有130余位科技外交官,战斗在科技外交第一线。我和彭斐斐将写有给驻美科技处同志寄语的“亲情卡”挂在大厅“亲情树”上,深深思念中美建交后在那里开中美科技合作工作的远方同志。联欢会的主题是《我和我的祖国》,在新老外交人员讲话和众多表演后,最后一个“压轴”节目是请6个部门选60对外交官夫妇上台,接受儿童鲜花,科技部选我和汤卫城、刘昭东、王勉铄、靳仲华夫妇上台。主持人董卿说这些伉俪中有的已经携手走过50载春秋,从青丝到白发,见证了新中国外交的发展和成就。当年我和彭斐斐结婚52年,金婚已过,也进入了这个行列。根据节目安排,要求6个部门各推一对老外交官站在前排,接受各部部长献花,我俩获此殊荣,接受科技部万钢部长献花,这是我们从事科技外交工作中一生的荣誉。最后歌唱家张也领着我们和老干部合唱团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大家激情涌动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现在重温书中保尔·柯察金所讲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深感自己为祖国科技外事事业做过一份贡献,也是实现了人生价值!

广告



来吧，为梦想成真！

充满活力的国际化现代新城——潍坊高新区

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高新区建设20年先进集体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引领示范区
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